

10月20日,本报报道了《黄浦发现150多年前“果育堂”界碑》,经专家证实,这块界碑见证了本市老城厢和善堂发展的一段历史。其实在中国古代无所谓“市政”和“民政”,市民的“扶贫帮困”,济难救助一般由称之“善堂”的民间慈善机构实施的。善堂大多由地方贤达、著名人士发起成立,人员大多为“志愿者”,经费少量来自地方政府的资助,大部分来自社会团体,如同乡会馆、同业公所,及民间的慈善捐款,涉及到的内容如赡老、育孤、施药、助衣、代葬、收殓路尸、栖流、救生,以及收买字纸(又称“惜字”,古人十分敬重文字,印或写过字的纸不能随意糟蹋,必须集中后统一销毁)、水龙救难(水龙即消防)、创办义校等,事实上承担了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设和民政救济的事务。清代,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,上海逐渐发展为都市,从各地进入上海的人口日益增长,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。到了清末,上海旧城见于记录的善堂有数十家之多,分别承担不同的慈善项目,果育堂只是其中的一家。

上海早期的善堂

上海最早见于著录的慈善机构叫“养济院”,实际上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救济孤寡老人的机构。据《同治上海县志》中记:“养济院,初在县西南。明洪武七年(1374年)建,成化、弘治间知县李葵、董钥增建。嘉靖元年(1522年)知县郑洛书重修。万历年,移建海防署西。后废。国朝(清朝旧时,把当朝称之‘国朝’)移建大南门外陆家浜南,俗呼‘孤老院’。嘉庆十七年(1812年)毁,仅剩厅三楹,东厢三楹。今尽废,无考。”现在上海老城厢还有一条叫“县左街”的小路,中国古代定方向时以南面为正面,“左”一般指“东”,这条“县左街”就是以在县衙门的东侧而得名的,当然,原上海县衙门就在“县左街”的西侧,这样就可以大致确定,那个养济院最早在今天县左街的西南。“海防署”又称“海防道署”,是明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为抗击倭寇而建立的一个军事机构,道署和兵营设在西门内,旧址在清咸丰五年(1855年)重建为文庙,今天,文庙西侧墙外是一条叫“老道前街”的小路,“老道前”就是“老海防道署前”的意思。“陆家浜”是上海大南门外的一条河流,1926年填平筑路,就是今天的陆家浜路。养济院很早就废了,但我们仍可以根据零星的记录,找到它历年的大概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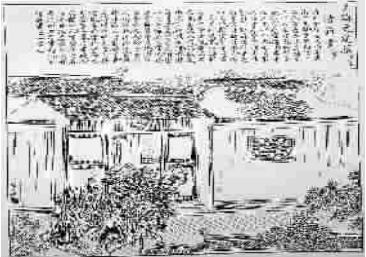
清嘉庆、同治《上海县志》中记录了一个叫“育婴堂”的机构,由一位叫张永铨的绅士倡议建立于康熙四十九年(1710年),一位叫曹炯曾的绅士捐出自己在城里“闾水桥”的住宅作为堂所,更多的人捐赠了土地和金钱,其中一位叫朱之淇的人一次捐资3000两,这样,育婴堂开张时就募集到8000缗,田172亩。中国古代重男轻女思想严重,古人又没有节育措施,于是,溺女婴、弃女婴的现象极为普遍和严重,育婴堂的主要职能是反对溺婴、弃婴,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收养弃婴。育婴堂的资产难以承担收养的弃婴,后来得到上海道署的资助和帮助,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拨款,使工作得以正常开展。《同治上海县志》:“闾水桥(在县桥南)跨半段泾者,为亭桥。”“县桥”又称“阜民桥”,以上海县衙门口有一座叫“阜民坊”的牌坊而得名,以前上海城里有条“阜民路”,即以“阜民桥”得名,由于沪西有一条与“阜民路”谐音的“富民路”,1980年就将“阜民路”更名为光启南路。“半段泾”是一条小河,1914年前填平筑成蓬莱路。清朝,这里有一条叫“育婴堂街”的小路,民国后更名为“西唐家弄”,育婴堂的旧址就在今西唐家弄北面。

清代上海善堂

◆薛理勇



当时上海最大的善堂同仁辅元堂



收留年轻寡妇的清节堂



收养老弱病残的普育堂



创办义校的果育堂



施药义诊的济善堂



收留弃婴的育婴堂

以上插图摘自清末的《图画日报》

貳

上海最大的善堂 同仁辅元堂

同仁堂正式成立于嘉庆九年(1804年),是由上海知县倡议,联合多家零散的善堂建立的半官方慈善机构,堂址就设在药王庙毗邻的乔家民宅,门前的一条小路就叫“同仁辅元堂弄”或“辅元堂弄”,这条路很短,只有三四十米,后来改为“药局弄95弄”。该堂的经费部分来自政府的拨款,部分来自团体和私人的捐款,由于是政府出面倡议的善堂,上海各会馆公所的捐款额较大,分为一次性的“总捐”和每年一次的“岁捐”,上海实力最强的豆业公所则每月捐款,当然,同仁堂也分配给捐款机构一定的墓穴比例,帮助他们处置同仁的丧葬事宜,据《同治上海县志》讲,该堂的主要善事分:“六十贫苦,无依或残疾,不能谋生者月给钱六百;施棺,凡贫无以殓者,予之棺并灰砂百斤;掩埋,凡无主棺木及贫不能葬者,一律收埋。后又建义校,施棉衣、收买字纸及代葬、济急、水龙、放生、收殓路毙浮尸等事,他如栖流、救生、给过路流民口粮悉预焉,故同仁堂为诸善堂之冠。”

辅元堂由上海人梅益奎,海门人施湘帆、慈溪人韩再桥等发起创建于道光二十三年,堂址与同仁堂为邻,主要是殓棺局,就是向无力埋葬的贫民提供棺木并建立义冢,咸丰五年(1855年)与同仁堂合并,合称“同仁辅元堂”。咸丰年间的上海是多事之秋,咸丰三年初,太平军顺长江而下占领了南京,并改南京为“天京”,建立了太平天国王朝,使江南的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估计有两万南京的难民逃难到了上海,许多南京难民定居在城外陆家浜南,形成了一条以南京人集

叁

果育堂、普育堂和新普育堂

旧中国的启蒙教育通常由宗族的私塾、同乡的会馆、同业的公所办的子弟学校,以及私人办的私塾来承担的,私塾的收费较高,就把许多贫困家庭女子排挤于外,这始终是困扰地方政府的大问题。据《同治上海县志》中记载,清咸丰年间,上海人江驾鹏、费培镇、顾锡麒、姚曦、萧缙等集资在肇嘉浜庄家桥南(今庄家街)办了所义塾,《周易》中有“山下出泉,蒙。君子以果行育德”之句,大意为:山下涌流的泉水,白花花一片,懵懵懂懂,有先知的君子,用果断的行动,开展启蒙,培养人的高尚品德,于是以这所义校为核心,建立了一个善堂,取名“果育堂”。

1855年初,清兵借助租界的军事力量镇压了小刀会,战争结束后的上海老城厢满目疮痍,惨死马路的尸体亟须埋葬,家破人亡的孤寡老人急需救济,果育堂立即拓展自己的慈善项目,正如近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冯桂芬在《果育堂记碑》中所讲:“上海果育堂,其始为义塾也,就民居为之,继乃扩为堂,施衣、施棺、施米诸善事惟办。”同时,果育堂又添置水龙,建立公益的救火机构,成立“达生局”,是上海最早的妇产科诊所,近代以后,上海逐渐发展为通商巨埠,进出上海的船只越来越多,水上灾难层出不穷,于是果育堂又与同仁辅元堂联手,组织成立“水上救生局”,帮助政府处理水上灾难,它实际上也成了上海最早的处理水上灾难的机构。由于果育堂显赫成就,也得到上海政府的认可和支持,1858年,政府就拨出“袁公祠”的空地,果育堂就迁往那里,二十几年前,上海还有一条叫“果育堂路”的小路,就是以果育堂得名的,后来这里建造“太阳都市花园”住宅区,果育堂路被注销了。

陈化成(1776-1842),福建同安(厦门)人。行伍出身,历任金門总兵、福建水师提督,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,调任江南提督,负责长江兵防。1842年6月,英军进犯吴淞口,陈化成身先士卒,英勇战死,道光皇帝给了他一个“忠愍”的谥号,“愍”是悲痛、忧伤、哀怜的意思,这也许是道光皇帝为陈化成的效忠表示悲痛和哀怜吧。《同治上海县志》:“陈公祠,在县西淘沙场旧申书院院址,祀江南提督,谥忠愍陈化成,道光壬寅御敌吴淞口死事。诏就死事地方建立专祠,邑中好义者捐建别祠。”陈化成的

中而得名的——南京街,这条南京街一直到十几年前建设地铁4号线南浦大桥站,以及周边旧城改造时才注销。同年秋,上海又爆发小刀会起义,一年多后,小刀会起义被镇压,上海城市遭严重损毁,而咸丰十年,南京的太平天国为了摆脱清军对南京围困的压力,派忠王李秀成突围东进,骁勇善战的李秀成率东进军一路东下,仅数月就攻克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昆山、松江、宁波、杭州等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城邑,并逼近上海,估计有20万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,约有余十万进入上海租界,数万人居上海老城厢,给上海城市管理、社会治安、慈善救济带来极大的困难,《上海县志》讲,同仁辅元堂,“咸丰三年,金陵之乱,难民南下,劝捐留养共费六万余缗。嗣于十年四月间,苏、常失守被难,男妇转徙来沪者不下二万余名,复劝捐留养。”以后,同仁辅元堂除了经营一般的慈善救济,“又加代给尸场验费,及收买淫书、挑除垃圾、稽查渡桥之事”,实际上就是代理地方政府的市政管理。

古代,苏州河上没有桥梁,过江全凭木船摆渡,沿江设有多处渡口,设在苏州河的第一个渡口就叫“外摆渡”或“头摆渡”,1854年,有一个叫威尔斯(Wills)的英国人组建了一个苏州河桥梁建筑公司(Sookow Creek Bridge Co.)在外摆渡建了一木桥,就是今天外白渡桥的前身,人与车辆过桥一律收费,桥梁比摆渡方便、安全、迅捷得多,使船户损失惨重,也使冲突激烈,后来就由同仁辅元堂出面调定,并把船户分散安置到各个摆渡口,才平息了冲突。

正祠在他就义的吴淞口,据悉,陈化成祠在大修,明年开放,上海的陈化成祠属于“别祠”。

应宝时(?——1891年),浙江永康人。道光二十四年举人,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期间在江苏举办团练,1860年配合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,次年,在上海设立会防局。1864年任代理上海道,1865-1869年任上海道,是历史上任上海道时间较长的一位。他任上海道期间,正是清军、洋枪队镇压太平军及结束的阶段,战争迫使无数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避难,其中有许多家破人亡的孤寡老人,无家可归的孤儿,对上海治安影响很大,于是,应宝时就在“陈公祠”建立普育堂,“分立七所,收养老男、老妇、男残疾、女残疾、及养病、抚教、贴婴。并设义塾及医药两局”。应宝时是上海道台,主管海关,其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和松沪厘局,其规模仅次于同仁辅元堂。

普育堂是上海道署出资,委托民间承办的善堂,1911年上海光复,上海道署倒台,普育堂的经费来源中断,于是与果育堂合并后改称“新普育堂”,并迁至南门外同仁辅元堂义地建造新善堂址,并于1913年竣工使用。新普育堂占地约3.3万平方米,按收容贫民1500人设计,耗资约12万两,建有楼房13幢,其东、西两侧及今普育东路和西路,南侧的路俗称“煤屑路”,又俗称“新普育堂路”,1928年,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派员来上海,要求上海特别市政府和上海商界联合举办“中华国货展览会”,并于该年11月开幕,这是一次政治色彩极浓的提倡国货的展览,不可能在租界举办,而华界又没有合适的场地,遂决定借新普育堂场地和建筑举行,于是,由政府出资拓宽、重修原“煤屑路”,筑成后即命名为“国货路”。11月1日下午2时中华国货展览会正式开幕,蒋介石主持升旗仪式,张岳主席致开幕词,孔祥熙,胡汉民、谭延闿等军政要人出席开幕式,大会还动用飞机散发传单,新普育堂址长期归民政机构使用,如今在旧址上新建的是上海民政博物馆。

清代,上海的善堂大多系民间慈善团体,经费大多来自团体、民间捐款,部分来自政府拨款,1911年上海光复后,由于政权变更,善堂的经费无法保证,遂由上海地方政府将主要善堂合为“上海慈善团”,由该团分配资金,各堂继续开展慈善活动,于是使民间善堂改变了性质,大多经营、管理不善而先后关闭。新普育堂的堂主是著名的天主教人士陆伯鸿,政府无法插手,才使它一直规范经营到1949年。